

中国力量丛书

# 和平的力量

雷巧玲 金新 著

非外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力量丛书

# 和平的力量

雷巧玲 金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平的力量/雷巧玲, 金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1

(中国力量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0830 - 4

I. ①和… II. ①雷…②金… III. ①和平学 IV. ①D0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4246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侯苗苗

特约编辑 明 秀

责任校对 王纪慧

责任印制 王 超

---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129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陕西省委宣传部共建马克思主义学院经费资助出版

# 目 录

第一章 国内和谐稳定的价值及其挑战·····	1
第一节 国内和谐稳定的价值·····	2
第二节 国内和谐稳定的挑战·····	4
第二章 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现状·····	12
第一节 社会基本稳定·····	12
第二节 社会稳定形势严峻·····	17
第三章 当代中国和谐稳定的影响因素·····	21
第一节 经济发展因素·····	21
第二节 政治发展因素·····	31
第三节 社会转型因素·····	41
第四节 文化因素·····	42
第五节 生态环境因素·····	48
第四章 增强当代中国和谐稳定的路径·····	53
第一节 创新治理理念·····	54
第二节 完善治理机制·····	56

2	第三节 提升治理能力 .....	63
	第五章 国际和平的内涵与价值 .....	67
	第一节 国际和平的内涵 .....	67
	第二节 国际和平的价值 .....	76
	第六章 国际和平面临的挑战 .....	81
	第一节 全球层次的和平挑战 .....	81
	第二节 地区层次的和平挑战 .....	87
	第三节 双边关系层次的和平挑战 .....	92
	第七章 国际和平挑战的根源 .....	100
	第一节 全球层次和平挑战的根源 .....	100
	第二节 地区层次和平挑战的根源 .....	104
	第三节 双边关系层次和平挑战的根源 .....	113
	第八章 中国的和平外交 .....	117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和平外交 .....	117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和平外交 .....	125
	第三节 十八大以来和平外交的新发展 .....	130
	余论：维护和平的方略 .....	136
	参考文献 .....	145
	后 记 .....	159



# 第一章 国内和谐稳定的 价值及其挑战

和平在国内体现为没有战争、动荡与骚乱的稳定状态。稳定不仅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家及思想家追求的最基本的政治价值，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稳定就其状态而言，可分为静态稳定与动态稳定。静态稳定是指“现状的静止不动，并通过抑制的手段维持现存的秩序”。动态稳定则是“把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平衡，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调整来维持新的平衡”<sup>①</sup>。和谐稳定是对传统的静态稳定的超越，是国家、执政党和政府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动态稳定状态。具体而言，和谐稳定是“建立在制度和规范的基础之上，以良好的运行机制作保障，能够与外界互动并适应外界变化，整体上保持社会运行的秩序性和连续性，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在动态平衡中良性运转的一种状态”。“和谐稳定具有动态性、相对性、主动性、时代性、开放性、规范性、可控性、整体性、非强制性和可持续性等特点。”<sup>②</sup>

稳定就其内容而言，包括思想稳定、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及社会稳定等。在实现中国梦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思想稳定是精神支

---

① 俞可平：《动态稳定与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周小毛：《和谐稳定：解读稳定的另一个视角》，《求索》2010年第8期。

柱、政治稳定是根本保障、经济稳定是坚实基础<sup>①</sup>、社会稳定是基本前提。和谐稳定就是思想稳定、政治稳定、经济稳定及社会稳定呈现出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协调与有序的状态。

## 第一节 国内和谐稳定的价值

### 一 国内和谐稳定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

近年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对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性。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指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要聚精会神搞建设，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一个是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近代以来的内乱与外患，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战火频频、兵燹不断，内部战乱和外敌入侵循环发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堪回首的苦难”。因而，“中国需要和平，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就像万物生长需要阳光一样”<sup>②</sup>。2014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中再次强调：“中国需要和平。中国最需要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任何动荡和战争都不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珍惜和平，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自古崇尚‘以和为



<sup>①</sup> 陆卫明、薛琳：《邓小平稳定思想探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sup>②</sup> 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第2版。





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sup>①</sup> 和谐稳定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更符合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

## 二 国内和谐稳定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支撑

中国的民众不仅非常珍视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而且对和谐稳定的国内环境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关键支撑的观点高度认同。《人民论坛》于2015年11月16—26日，就“成就全球性大国，关键支撑有哪些”进行了网络及纸质的问卷抽样调查，总样本量5515份，其中网络问卷3978份，纸质问卷1537份。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关键支撑因素中，“政局稳定，社会和谐发展”位居第一，90.33%的受访者认同这一观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共同面对全球挑战”（占比85.25%）、“经济实力强，前景看好”（占比83.47%）分别位居第二、第三。可见国内和谐稳定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大国最关键的支撑因素之一。<sup>②</sup>

## 三 国内和谐稳定是中国最大的制度红利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与国内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社会稳定。早在1987年，邓小平就指出，要实现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21世纪用30—50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

<sup>①</sup> 习近平：《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 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8日第2版。

<sup>②</sup> 高骊、刘瑞一：《成就全球性大国，关键支撑有哪些——基于中国公众的认知状况分析报告》，《人民论坛》2015年第33期。

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sup>①</sup>。这位身经百战并亲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深知稳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sup>②</sup>。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深化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提出稳定是前提，发展是目的，改革是动力。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习近平认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sup>③</sup>可见，重视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执政方略。发展经济学认为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对于经济增长极为重要。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制度红利。社会和谐红利不是短时间就能够实现的，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逐渐得到社会和谐红利”<sup>④</sup>。

## 第二节 国内和谐稳定的挑战

由于现代化过程本身充满了社会风险，加上中国现代化后发外生的特点及国内经济步入新常态、自媒体的异军突起深刻改变了社会治理生态，因而中国国内的和谐稳定面临一系列的严峻挑战。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② 同上书，第284页。

③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84页。

④ 厉以宁：《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制度红利》，《中国经济周刊》2013年第50期。



## 一 现代化过程充满社会风险

现代化是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锋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sup>①</sup>。社会稳定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国遭遇的共同难题，因为现代化与社会稳定存在着“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sup>②</sup>。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sup>③</sup>。实现政治稳定的根本途径在于调整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政治具有现代化所要求的制度化。美国学者布莱克认为，现代化本身意味着打破传统的各种程序，即破坏原有的社会稳定，“必须把现代化看作是同时具有创新和破坏作用的过程，它既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可能使人类付出混乱和痛苦的极大代价”<sup>④</sup>。现代化成功的关键是建立和维持现代化同社会稳定之间的调适关系的能力。

① 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现代化理论、进程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9页。

② [美] 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页。

③ [美] 同上书，第4页。

④ [美] C. E. 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 二 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挑战

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呈现出内生与外压、自发与自觉、长期渐进与短期激进等诸多不同特点，所面临的社会稳定问题也各不相同。早发内生型现代化的国家社会相对稳定，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的不稳定问题则较为突出，容易发生政变、动乱、内战等社会动荡问题。因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如下一些“迟发效应”：一是目标“错位效应”，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的现代化都带有追赶型特点，“它们不仅要追赶发达国家早已达到的历史目标，而且还要追赶它们正在迈向的目标”，因而现代化的任务空前繁重；二是“高速效应”，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要在压缩的时空中高速推进现代化，“必然使早期现代化国家中曾经出现过的种种失调和社会危机以更加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激增”；三是“同步效应”，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席卷全球，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不再具有化解矛盾的任何优势，也已无处可以转移危机”；四是“示范效应”，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人们往往以发达国家为榜样，容易产生种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一旦期望不能兑现，他们就会萌生对现实社会的不满”。此外，还有“人口效应”“环境效应”等，同样加剧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的两难处境。<sup>①</sup>

中国现代化起步较晚，属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在实现中国梦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无可讳言，在压



<sup>①</sup> 汪信砚：《现代化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比较历史研究》，《江汉论坛》1999年第4期。



缩的时空中，我们也累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

### 三 经济新常态下社会风险加大

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sup>①</sup>。根据戴维斯的J曲线理论，“政治最不稳定的时刻是，人们的期望值在不断上升，而政府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却在下降。换句话说，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后出现短暂的逆转，往往是最容易发生政治动乱的时刻”<sup>②</sup>。因而在经济发展由非常态步入新常态时，社会风险将会加大。

### 四 微时代社会治理生态巨变

微时代又称自媒体时代。自媒体（We Media）一词源于2003年7月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出版的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理斯（Chris Willis）撰写的研究报告“*We Media*”，他们把自媒体定义为“一个普通市民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sup>③</sup>。具体而言，自媒体是对以微博、微信、博客、播客、论坛及即时通讯等为载体的个人媒体的统称。

自媒体是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不同于大众传媒及传统网络

<sup>①</sup>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第2版。

<sup>②</sup> 燕继荣：《发展政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sup>③</sup> Shayne Bowman, Chris Willis,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Reston: 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2003.

传媒，自媒体的传播主体由专业的新闻媒体工作者转向了一般的社会大众；“传播内容呈现出多样化形态，形式则以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内容为主；受众为横跨时间和空间的不确定的人群；传播效果具有不确定性”<sup>①</sup>。自媒体所具有的自主性、交互性、便捷性、动员性等特点，使网民可以自主表达、自我参与、互动演绎，人人成为信息和新闻事件的收集、整理、报道、分析、点评和传播的记者，“信息流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空场域中得到最彻底的释放和交融”<sup>②</sup>，不断推演着现实生活中的“蝴蝶效应”。

近年来，我国自媒体发展迅猛，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2018年1月的统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5.8%。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人，手机上网的网民占比为97.5%。<sup>③</sup>又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2014年6月25日发布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4）》，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新媒体第一大国，自2013年以来，微传播已成为主流传播方式，“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微博、微信、微视频等大行其道，微传播急剧改变着中国的传播生态和舆论格局”<sup>④</sup>。

自媒体引发了社会治理生态的深刻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① 邓新民：《自媒体：新媒体发展的最新阶段及其特点》，《探索》2006年第2期。

② 倪明胜：《自媒体时代下的领导干部需提升媒介素养》，《学习时报》2013年5月6日。

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8年。

④ 唐绪军：《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No. 5（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第一，自媒体打破了信息垄断。

在信息不对称的历史时期，社会管理者拥有对信息资源的绝对垄断权，普通民众甚少话语权，二者的关系是“我说你听”，从而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治理。而在信息透明的自媒体时代，信息垄断被打破，民众有了充分的网络话语权，淡化了他们的政治疏离感，极大地激发了民众的政治热情。

第二，自媒体使政治参与发生巨变。

自媒体以其去中心化的平等性、超越时空的便捷性以及低成本参与等特点，为网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也带来了革命性变革。自媒体使政治参与主体具有广泛性、参与渠道呈现宽广性。由于网民都可通过多种方式阐发自己的政治观点，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公共话语空间，并以舆论压力和议程设置的形式直接作用于政治系统，在体制外开辟了一条公民政治参与的新渠道”<sup>①</sup>。自媒体增强了政治参与的深度及效度，通过自媒体，网民不仅可以充分、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还可以“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积极主动地进行持续关注、评论，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持续地作用于政治系统，直至推动相关政策部门及时、有效地解决”<sup>②</sup>。

第三，自媒体增强了网络监督力度。

自媒体时代，干部与民众的关系悄然发生逆转。“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互动性特点营造了一种‘围观’但不在‘现场’的独特语境，普通民众在关注社会管理者的同时，也有机会和胆量相互议论，无所顾忌地发表彼此的意见和观点。‘人人都是传播者’，

<sup>①②</sup> 曾建国、陶立坚：《微博新媒介优化政治生态的意义》，《学术界》2014年第3期。

普通网民轻松拥有了网络话语权，容易形成对社会管理者的舆论攻势。处于舆论中心的社会管理者的位置与之前发生了颠倒，他们不再可能对普通民众实施有效监控，却反而成了被监视的对象。”<sup>①</sup>而且民众对干部的监督呈现出人人可监督、时时可监督、处处可监督的特点，“微博上被围观、被曝光、被拍砖的事件此起彼伏，让许多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闻之色变”。正如网上所言，“微博一转，围观一万；反腐一动，倒下一片”<sup>②</sup>。

#### 第四，自媒体使干部治理能力面临挑战。

从传统社会物理空间的社会治理到自媒体时代虚拟空间社会治理的转换，微政务成为治国理政的新路径。据统计，“截至2013年10月底，经腾讯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已接近16万个，其中党政机构92000个，党政官员67000个。较2012年同期，总增长率为128.39%，其中政府机构增长率为104.60%，公务人员增长率为171.17%。在微信平台上，已开通的公众账号超过200万个，公众账号日均注册量为8000个，其中经认证的公众账号超过5万个，而政务微信公众账号总数超过3000个，约占认证公众账号的6%。政务微信在应急管理、舆论引导、社会组织动员等领域发挥了强大的社会功能，产生了积极有效的影响力”<sup>③</sup>。微政务对党政干部的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正如互联网政治学家安德鲁·查德威克所言：“由于社会背景和制度架构的独特性，中国正在形成复杂的、本土化互联网政治。这种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政治，广义而言，是对既往基于父爱主义和全能政府的政治治理的拨



① 周菁：《与民意面对面：网络问政新趋势》，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② 肖楠：《“微博恐惧”成普遍心态，官员最担心什么？》，《人民论坛》2013年第6期。

③ 唐绪军：《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 No. 5（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正及调整——尽管这种变化从政治制度设计来看有不情愿和被动的意味；狭义而言，是对形形色色的境外网站、境内网站、互联网及新媒体信息流动、网民意见及网络社群的管理政策的理念更迭与多方博弈。其中，特别是越境数据流——点对点的跨越国家政治疆界的数字化电子数据传输，在过去、现在，都引发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国情政治和其他意识形态问题。”<sup>①</sup>

自媒体的快速发展，不仅使社会治理生态发生巨变，使干部治理能力面临挑战，也使社会的和谐稳定面临新的挑战。

---

<sup>①</sup> [英] 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任孟山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